

鄂湘赣边区有这样一个村

——《县级经济丛书》之一《鲤港村经济》·如是说

陈 聃

《鲤港村经济》作为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伍新木副教授主编的《县级经济丛书》中的一种，是青年理论工作者王一鸣在下派湖北省通城县工作期间，在调查和搜集了通城县关刀镇鲤港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后撰写的，有代表性地、综合地反映了本世纪下半叶鄂湘赣边缘地区的农民生活。

《鲤港村经济》共14部分：一、前言，二、鲤港村概貌，三、村级报表制度，四、村庄人口，五、家庭经济，六、村民生活，七、农业耕作，八、土地分配和利用，九、工副贸易，交通水电，十、教育卫生，文化宗教，社会治安，十一、影响村民生活的几种社会因素，十二、行政体制沿革与职能，十三、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十四、后记。内容上，有农村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的记录，全村的经济概貌及家庭经济各有专章阐释；有农民经济生活之外的文化、宗教、行政组织等情况的介绍，农村文化诸现象和影响村民生活的各因素也有陈述。在章节设计上着重反映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整合及其各自功能，也安排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从而提出作者的见解。

从县级经济研究的角度看，村是县——乡（镇）——村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将这个

·《鲤港村经济》，王一鸣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定价：3.90元。湖北省计委《计划与市场》杂志社（邮编430072）代办发行。

环节独立出来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小社会，尤其是这个小社会中包含着一个最具体的因素——户，户中的中国农民。《鲤港村经济》正是最逼近地反映了社会最基层的一个村，最贴近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情最具体深入的一斑。这是《鲤港村经济》的一大特色。

当然，要了解中国农村，还需要了解许许多多各种类型的村。众所周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写过一本《江村经济》，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而《鲤港村经济》的作者在撰写该书时，也研读了包括《江村经济》在内的费先生的许多著作和文章。故在前言中写道：

我自知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我都不可能达到费先生当初的水平，但事隔半世纪，有人再作费先生当年所作类似的工作，也无疑是会有意义的。正象费老自己所说：“我明白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农村，而且都在变革之中，我没有千手万眼去全面加工观察，要全面调查，我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社会结构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运行，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的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他还说：“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求条件不

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是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概括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类型本身也可以由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这样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但是可以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

作者在这里所表述的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第二个特色。

由第二个特色,我想到这本书的第三个特色,那就是创新性和作者对这种创新性所持态度的客观性。如果无论是体例、表述方式,还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都因袭前辈的工作,那末《鲤港村经济》也就不成其为20世纪中末期的“这一个”了。这个区别在具体的章节中是随处可见的,如在第二章,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如实地录入了责任制前后这个村的统计、会计报表,尽管作者几乎未加评述,但我们不难从那些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表式中,看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与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在农村掀起的波澜和给农民带来的不同的震撼。又,全书专有一章“影响农民生活的几种社会因素”,这些往往是为人们所忽视,而作者在这里投以了较多笔墨。“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是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尽沧桑,许多东西总是不变。农民们用一种恒定的姿态对付着朝代更替、政策变换。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旧的习惯无论怎样坚如磐石,毕竟在时间的磨砺中悄悄地发生变革。”到底是些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请见本书第十章。此外,关于“生态环境”、“乡镇企业”这类热门问题,作者在第十二章中也谈了自己的观点。能在1987年将农村生态环境作为“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的第一点,不能不说作者是有眼力的。而对“乡镇企业”,作者提出的观点,

虽不一定正确,但却是别具一格的,至少是道出了人们的一种担忧。作者认为,发展乡镇企业“多少让人感到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在客观上存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情况下的所作的应变反应”。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在不合理的体制下“自己救自己”的办法。这种办法又以自身的许多不成熟,比如人、财、物的相对浪费,进一步损害最基层农民的利益。因此“在鲤港,在鄂、湘、赣边区村村办乡镇工业的条件还不具备。”对此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村过剩人口问题,作者认为,国家、城市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鲤港村经济》基本上是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常识指导下的对现实的实证描述,它没有完全照套某个理论,或许反过来还正可作为某些理论的原始分析依据。当然客观地说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不足。以当代社会学流派为例:结构功能理论的功能分析范式为:第一步对研究对象——组织或个人的行动作纯粹的描述;第二步描述和估价组织结构和组织活动对于成员的“意义”;第三步认识社会成员们动机上是否一致;第四步考察各种活动的客观结局等。对照之,作者实际上只作了第一步工作和其他几步的部分工作。但这也许更便于运用“社会功能理论”之后的“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作相应的分析。不过这样好象我又不是在指出该书的不足了。还是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是学经济学的,对社会学知识知之甚少,鲤港村不同于江村之处很多,其中鲤港是一个行政村,江村是个自然村。江村总人口1458人,总面积3065亩,农地2758.5亩(占总面积的90%);鲤港总人口1732人,总面积2250亩,农地1298亩(占总面积57.7%)。一个是水乡平原;一个是丘陵山区。因此,要考察鲤港村这样一个算不上大的

(下转第19页)

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混合公有制经济。在多种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还应发展其他所有制经济，例如公私混合所有制、私有制经济等。由于除国家所有制以外的多种公有制、多种公私混合所有制、多种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具有充分的或较充分的自主经营权，有着硬的或较硬的财产约束和预算约束，必须自负盈亏，它们不同程度地要求以市场作为自己活动和发展的条件，能够而且必须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参与市场的竞争，并接受市场的调节。因此，它们的发展会促进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形成和发展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将会把国有企业进一步推入市场，通过市场与其他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进行交往，建立联系，促使其减弱对政府的依附和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必定要求尽可能地自主经营，会更加关心自己的盈亏。在市场环境中，国有企业也将按照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的要求一步一步改革，并进一步地转向按照市场运行的规则行动。

注释：

• 本文中引用的统计资料，除未注明者外，绝大多数引自国家统计局的多种资料。

①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课题组：《我国工业生计划管理现状调查》，《改革》1990年第5期，第34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77.6%，1984年的69.09%，降至1989年的56%，一般地说由于国家只对国有企业下达指令性产品生产计划，由此推断，在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指令性计划的产品产值大约占28.5%。当然，实际上比重应更高些，因为省以下的单位有时也给所属企业下达指令性产品生产计划，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往往有一部分指导性产品生产计划实际上变成了指令性计划，而且还有层层增加指令性产品产量的情况。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9》第320页资料计算。当然，企业实际能使用的利润要少些，因为还要支付各种费用如摊派等。

③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课题组：《我国工业生计划管理现状调查》，《改革》1990年第5期第36页。

（责任编辑 傅股才）

（上接第73页）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兼及历史状况），其难度并不小。而我则是在一个偶然的的情况下，匆忙进行这项工作的。社会调查工作本身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的艰苦工作，而社会调查的对象又往往有着理论工作者不可切入的某些特性。比如语言不通，就很难了解那个特定语言环境下的许多事情；不是在那块土地上长大，便很难理解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当然情况还远不只此。因此，我不能不对我的这份考察报告持客观态度：它只是一份原始材料，一份由我这样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在一个并无选择的村收集的不全面的一些材料的汇集。从方法上讲，它是描述性的，着

重反映农村某一社区的现实是什么，在“为什么”和“怎么办”上着墨不多。

我一直记着一位大学教授朋友的话“实得苍白，再以中外理论给苍白的现实以红润。”可惜我没能做到这一点。我只希望我的苍白的描述能客观地反映现实，至于给“苍白”以“红润”，只好诚恳地寄希望于对本书有翻开一下兴趣的读者了。

但愿我的未经多少加工的原始材料对研究中国农村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的朋友们有一点参考价值。但愿今后获得和我同样机会的青年理论工作者能将类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责任编辑 沈晓冰）